



党和
国家

高层 智慧

中国
经济
出版
社

党和国家高层智慧

(文化篇)

主编：王瑞璞

中 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目 录

周恩来与文化名人共商文艺发展大计 (1)

☆周恩来：“别怕，你的过去我们了解”

☆“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盖叫天：“知我者共产党”

☆50年的革命友情

☆一杯茶水表深情

周恩来建议文史专员书写亲身历史 (80)

☆周恩来：“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

☆溥仪自嘲说：“皇帝是最没有用的人”

☆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花了周恩来一个整晚

☆杜聿明回答蒙哥马利：百万大军送给陈毅了

☆1966年8月文史专员室被迫关闭

对杨献珍及“合二而一”论的批判 (88)

☆毛泽东在提出“一分为二”的命题

☆毛、周、邓、陆、彭为他平反

☆康生对杨献珍政治清算

☆中央党校“是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

☆《关于“综合基础论”问题的申诉》乃狱中之作

批判《海瑞罢官》敲响了“文革”的开场锣鼓 (108)

☆毛泽东：“我希望中国能多出几个海瑞”

☆他观望《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吴晗为什么要加一段影射现实的文字

☆毛泽东把《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看

☆张春桥对周恩来封锁消息

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受宠大开“史学”杀戒 …………… (209)

- ☆毛泽东:不要压制年青人,让他冒出来
- ☆周恩来、邓小平纠“左”失败
- ☆康生、江青撑了戚本禹的腰
- ☆翦伯赞、郭沫若、范文澜排除阻力澄清历史
- ☆罗尔纲违心检讨迫于政治压力

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操练罪恶行径 …………… (234)

- ☆“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 ☆邓小平宣布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 ☆吴冷西给邓小平写信表示不理解
- ☆陈伯达最后圈定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毛泽东:“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的何等好啊!”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会议纪要 …………… (248)

- ☆毛泽东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
- ☆“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
- ☆林彪“委托”江青是一笔政治交易
- ☆正确的话,绝非江青一伙的本意
- ☆推行《纪要》数千名文艺家受迫害

“文化大革命”“洗礼”中国作家协会 …………… (266)

-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二个批示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出
- ☆周扬敲打另外三条汉子
- ☆“中央文件要下来,将刮起12级台风”
- ☆作协的几起“反革命案”
- ☆郭小川挎笔走江湖

《毛主席语录》编发把个人崇拜推向顶端 …………… (324)

- ☆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50余亿册

- ☆“节约闹革命,请给我拿二斤菠菜”
- ☆1964年1月5日,第一本《语录》问世
- ☆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
- ☆罗瑞卿在《语录》工作上的功与“罪”

毛主席像章的兴衰展示政治风云的变幻 (357)

- ☆七大主席团都佩戴毛主席像章
- ☆“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于1945年
- ☆张春桥在上海布置制作像章
- ☆王洪文审定100多种像章设计图
- ☆轮船与毛主席脸部“对峙”的政治事件

“安展”和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产生 (367)

- ☆毛泽东本人关于安源工运史的讲话
- ☆李维汉:毛主席去安源……是1921年
- ☆周恩来批准举办“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
- ☆搞展览,政治上抓了,生产上抓不起来也不行
- ☆《毛主席去安源》署名风波的起起落落
- ☆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国家馆藏一级文物”

狂飙般的红卫兵小报透视着被扭曲的文化 (383)

- ☆毛泽东:我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
- ☆毛泽东怒斥“百丑图”
- ☆《红卫战报》“押解”《解放日报》出售
- ☆“乔老爷”卖报照片登在外国报刊
- ☆《出身论》登在《中学文革报》被抢购一空

“一花独放”的“革命样板戏”空前大会演 (405)

- ☆“革命样板戏”在大讨论中诞生
- ☆观摩会上江青提出两个数字
- ☆红头绳怎么扎后,成果全部归她了

- ☆“样板戏”的专利不是江青
- ☆8 亿人民 8 台戏的日日夜夜
- ☆“样板”人物命运曲

举国上下的“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 (432)

- ☆毛泽东盛赞秦始皇
- ☆杨荣国大批孔夫子
- ☆《红旗》发表《林彪与孔孟之道》
- ☆“评法批儒”实质上是尊法反儒
- ☆“四人帮”抛出儒家卖国,法家爱国

轰轰烈烈的学“理论”与评《水浒》运动 (454)

- ☆毛泽东批示:“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 ☆周恩来手术前大声说:“我不是投降派!”
- ☆“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照样搞呀?”
- ☆《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
- ☆江青说:“评《水浒》是有所指的”
- ☆“群众专政指挥部”是非法组织

歌剧《江姐》穿越“文革”走红全国 (474)

- ☆毛泽东:“江姐那么好为什么让她死?”
- ☆刘少奇、刘志坚、刘亚楼提出修改唱词
- ☆周恩来随着音乐轻轻打着椅子扶手
- ☆刘亚楼指示:“精雕细刻,一定要打响”
- ☆罗瑞卿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 ☆江泽民签发通令批准阎肃记二等功

周恩来与文化名人共商文艺发展大计

☆周恩来：“别怕，你的过去我们了解”

☆“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盖叫天：“知我者共产党”

☆50年的革命友情

☆一杯茶水表深情

郭沫若

周恩来同志是我党杰出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作家、艺术家们的挚友和知音。他与当代文豪郭沫若同志有很深的革命的情谊。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郭沫若最早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那次郭沫若是去听周恩来的讲演，相互并没有打招呼。而真正的相识是在1926年3月阳翰笙、李一氓同志问郭沫若是否愿意参加北伐大军，希望他见一见周恩来同志，郭沫若欣然同意。俩人很快见了面，经过谈话，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挥起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4月14日，郭沫若见到周恩来，他说：上海现在不行了，我想回武汉组织力量讨伐蒋介石。周恩来同志说：你的意见很好，尽快走吧。当晚，郭沫若买好票，第二天就回武汉了。

后来，周恩来等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发动了南昌起义，郭沫若积极参加。在部队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

南昌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为了保存力量，经周恩来同志同意，郭沫若东渡日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为今后的革命斗争积蓄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前，郭沫若毅然回国投入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重新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

当时，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周恩来同志担任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是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的，在酝酿厅长人选时，周恩来竭力推选郭沫若。起初，郭沫若执意不肯就职，认为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干工作是耻辱之事。针对郭沫若的思想，周恩来一再与他倾心长谈，指出：“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并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沫若同志：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以前，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很亲切随便地称“沫若”、“沫若兄”，落款自称“弟豪”、“弟恩来”。而这次只有一句话的短

信,则开头称“同志”,落款写姓名。这一切都表明周恩来同志希望郭沫若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纸短情长,郭沫若拜读再三,终于走马上任,担任了第三厅厅长一职。

上任后不久,郭沫若亲自起草了工作计划,送交周恩来审阅。针对这个计划,周恩来做了细致的修改,并做了重要指示。有了周恩来领导,三厅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宣传抗战,募捐资金、慰劳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在武汉,而且遍及各战区,甚至深入到最前线。

国民党当局对此又恨又怕,百般刁难。1938年7月对政治部进行了大幅度的人事变动,排挤进步人士,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升任领导职务。郭沫若一气之下,接连三天未去办公,并产生了辞职的念头。

周恩来召集郭沫若和其他一些负责人研究工作时严肃地指出:“这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我们要提醒群众的意识,认识自己的力量,而同时也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依然是值得重视的。”对于郭沫若的辞职意见,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就是“那次周公向我动了声色”,“向来炯炯有神的周公的眼光仿佛要着火了,他向着我诘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他看我沉默着,又补充一句:‘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了委屈,比这大得多呢!’”

“为了革命的利益”,周恩来同志的疾言厉色使郭沫若顿时清醒,做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懂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和份量。十年后,郭沫若写道:“这是我受周公责备的唯一的一次。”他把周恩来看做是自己的良师,无比敬仰地比喻周恩来同志是“一棵擎天大树”。

1941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大规模公开地开展斗争是可能的了。这时周恩来指示郭沫若:“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沫若多才多艺,既是出色的戏剧家、诗人、作家,又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一生中有许多伟大的作品,利用文艺形式与敌人作斗争是他的拿手好戏。

1941年正值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他对敌人的愤怒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时机和方式。旧作《棠棣之花》经过修改上演了,这可以说是为新编历史剧演出打响了头一炮。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是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实行对共产党封锁、离间、孤立政策的一次沉重打击。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同志十分高兴,七次出席观看,并保留了这个剧的全部剧照。国民党当局对这出戏大为恼火,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就曾为此破口大骂。

郭沫若在剧中强调了“士为知己者死”这个主题。周恩来同志心领神会,多次指出:“郭老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主题?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郭老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他十分重视对《棠棣之花》的宣传,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专门讨论了历史剧问题和这出戏的演出,并决定《新华日报》出专刊,周恩来同志亲笔写了刊头题字“《棠棣之花》剧评”。他告诉郭沫若,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都非常喜欢《棠棣之花》的插曲《湘累》。郭沫若听后非常感动。这体现了周恩来同志对郭沫若的尊重和深情。

同年11月16日,郭沫若50寿辰。《新华日报》当天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周恩来同志写的社论《我要说的话》,这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这篇文章论述了郭沫若在新

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郭沫若大半生的战斗经历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完整的评价。郭沫若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是继鲁迅之后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的这一崇高的历史地位是周恩来第一个给予科学说明的。早在1938年,周恩来同志就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由中共中央作出党内决定,确认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周恩来在比较了鲁迅与郭沫若生活与战斗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经历之后,深刻地指出:鲁迅是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桥梁”,而郭沫若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鲁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为了庆祝郭沫若的50寿辰,周恩来还亲自拟定参加庆宴人员的名单,使众多亲朋好友聚集一堂。心情愉快的郭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周恩来也非常高兴,举杯同大家一起为郭沫若祝寿。没过多久,周恩来又为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再一次举行盛宴。这样的聚会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难得的。

在周恩来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有力支持下,郭沫若的创作激情有如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1942年1月《屈原》、同年2月《虎符》、同年6月《高渐离》、同年9月《孔雀胆》、1943年4月《南冠草》,他一口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5部历史题材的剧本。

特别要提到的是《屈原》。它通过对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昏庸无道的描写,有力地揭露了蒋家王朝的反动腐朽,暗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有光明的未来。

周恩来同志反复地阅读了剧本,多次亲临剧场观看排演,对其中的“雷电颂”尤为赞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

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怒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为了提高演出效果,周恩来还把主要演员找来,通过反复朗诵这段情绪热烈、文采照人的台词,对演员进行具体指导。他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正确表达郭老的思想感情。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果然,《屈原》的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每当舞台上演到“雷电颂”时,台下的观众便爆发出狂涛似的掌声。广大群众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周恩来同志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立了大功。”

周恩来对郭沫若的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十分关怀。多次写信问他:“除在报纸外,你有什么新的诗文著作发表?有便带我一些,盼甚盼甚。”在重庆时期,郭沫若常把自己写的文章、诗歌、剧本读给周恩来听,而后两人字斟字酌地共同讨论。遇到郭沫若一时表达不出意思的时候,周恩来一语提醒,恰到好处,俩人不由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有些学术方面的意见不大一致时,周恩来便让步说:“你是作家,尊重你的意见。”但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同志却从不含糊。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对话剧《孔雀胆》他就认为,这个剧虽然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周恩来不同意剧本对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的处理,嘱咐一定要改。郭沫若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

些历史人物常有偏爱偏见,这是很难改的毛病。”虽然此剧即要上演而来不及修改,但人们却再也没有听到郭沫若谈起这出戏,他的戏剧集里也没有收入。解放后,曾有人问他是否要修改这个戏时,他笑了笑,只是说让它留在故纸堆里吧。

周恩来同志对郭沫若《屈原研究》一书中的第三部分《屈原的思想》,经过仔细阅读后,不仅帮助作过一些修改,使提法更为科学,而且就作者所引典故是否有笔误提醒过他,周恩来就屈原所处的时代及其整个为人的估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尚有商榷余地。周恩来将郭沫若对“仁义”的阐释“把人当成人,该做就快做”,改为“该做就要做”。一字之差反映了精明干练的革命家和诗人气质的革命家的不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于抢摘胜利果实,把全国又一次推向了内战的深渊。这时候,周恩来要求郭沫若在国统区积极进行工作,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他对郭沫若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郭沫若以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党的领导、党的意图同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爱国人士联系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讲人民群众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共产党不便讲的话,在党和非党人士中间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946年,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代表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深知国统区黑暗的郭沫若不禁常常为周恩来同志的安全担心,但他见到周恩来同志时,又为他的镇定、乐观所感染。在《南京印象》中,他抒发了对周恩来同志的无比爱戴、敬仰之情。书中写道:

“仅仅两个月不见，周公比在重庆时瘦多了。大约因为过于忙碌，没有理发的闲暇吧，稍嫌过长的头发愈见显得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境遇是最难处的，责任那么重大，事务那么繁剧，环境又那么拂逆。许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但却丝毫不敢放松，不能放松，不肯放松。他的工作差不多经常要搞个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时间供他睡眠，有时竟至有终日不睡的时候。

.....

但是，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免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

同年11月，周恩来同志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谈判的罪行，飞返延安，郭沫若得知后，以诗相赠：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根节绝盘错，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

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

在诗中，郭沫若将周恩来比做疾风中的劲草，岁寒中挺拔的松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伟大革命品格的深情歌颂。

全国解放后，作为周总理的助手郭沫若先后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郭沫若在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热忱。而总理对郭沫若的工作、生活则关怀备至。建国初期，郭沫若常率和平代表团出国开会、访问，每次成行之前，总理都要接见他们，详细询问有关事宜，布置

工作；回来之后，又及时看望，听取工作汇报。

1955年，有一次郭沫若从香港乘坐荷兰的飞机前往日本，途中飞机发生故障，只好返回香港。消息传到总理那里，周恩来同志很着急，马上通过苏联使馆打电报到日本，叮嘱郭沫若不要坐飞机回国。随后又通过外交途径，请苏联方面派了一条船，专程接郭沫若回来。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对郭沫若的关怀，就更加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1966年冬，国内形势极度混乱。为了保护郭沫若，周恩来同志在“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把郭沫若列在宋庆龄之后的第二位，并派人专程看望郭沫若一家，转达他的意见：请郭沫若一家离开家里到外面去住，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强调，不要告诉机关，只带秘书和司机，防止泄密。等过了一段时间，局势有所缓和，总理才允许郭沫若回家居住，并将在郭沫若身边长期工作的秘书调回郭沫若处工作。

1967年以后，郭沫若经常陪同总理接见外宾。郭沫若这时年岁已高，身体又不好，总理在工作中处处照顾他。有一次，郭沫若陪总理送外宾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当时天寒地冻，寒风凛冽，又是黎明时分，总理回屋后就批评有关人员工作没做好，指出郭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让他吹风，然后又劝郭老回去休息。郭沫若因耳聋，没听清总理在讲什么，回家的车上郭老问秘书总理为什么发脾气，听了回答后，郭沫若感慨万分：“他自己不是也在吹风吗？”

还有一次，总理拿着参考资料与郭沫若谈一个问题，郭沫若因为没看到参考资料，所以不知道。总理马上追问为什么没看到？郭老回答，参考资料是通过交换站送来的，星期天休息，所以今天看不到。并说提出几次意见也没有改进。总理听后马上对工作人员说，你告诉新华社的领导，以后星期天交换站要安排

人值班,并马上派人将参考资料送到郭老家中。

1974年年初,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总理当时派人到郭老家中,传达了三点指示:一,为保证郭老的安全,24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二,郭老家的房间和走廊要铺上地毯;三,请郭老从小卧房中搬到大办公室住。后来总理见到郭老,向他解释原因:地面太滑,铺上地毯,防止摔倒;人老了,需要充足的氧气,屋子太小,氧气不足,危害身体。7月间,郭老患大叶肺炎住院期间,发生了一次医疗事故:郭老因打针过敏引起高烧。总理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作了批示:以后给郭老用药要特别慎重,一定要经过试验再用。对于郭沫若的病,总理很关心,经常派人探望。周总理的情谊使郭老很感激。

同样郭沫若对总理的感情也很深,他对总理既敬重又佩服,一直协助总理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处境艰难,郭沫若主动为总理分忧,在外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接待外宾时,虽然身体不舒服,耳朵听不清,但坚持让秘书在身边记录给他看。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的儿子在北京农学院被歹徒绑架,22日被害致死;在这期间,郭沫若曾陪同总理接见过外宾,由于他考虑总理工作繁忙,处境险恶,所以没把此事告诉总理。事后夫人于立群责怪他,郭沫若悲痛地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1974年春,江青在中央一次万人大会上,当着周恩来同志的面,指名批评,侮辱郭沫若。会后几天,张春桥、江青先后跑到郭沫若家里,当面逼迫他写文章,要他承认当年抗战时期写的历史剧和历史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动毛主席的;要他“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对“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反对总理的阴谋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认为“四人帮”反他也是针对总理的,所以他感到极大的愤怒,坚信“历史自有公论”,当面严厉斥

责张春桥：“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使得本来就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张春桥哑口无言。

由于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和被“四人帮”恶毒围攻，郭沫若患上了重病。当他得知总理病重后，心情很沉重，常在报上查找总理的消息，总理的病情一直是他惦念的事。就在这时，沉重的打击又向他袭来，1976年1月6日，周恩来同志逝世。他悲痛欲绝，在病床上满怀无限哀思和对“四人帮”一伙的无限愤恨写下了一首七律诗篇：

革命先驱辅弼才，巨里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在当时“四人帮”横行，形势险恶的情况下，敢于写下这样的诗篇，没有无畏的气概是无法想像的。他不顾体弱病重，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坚持要去向周恩来同志作最后的诀别，坚持要去参加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回家后他在日记本上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字迹因情绪激动、手太颤抖而难以辨认，但郭沫若借用古人荆轲的诗句表达了他自己对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无限哀思。

周恩来同志与郭沫若同志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期间，不管环境怎样恶劣，他们之间的友谊始终是牢固的，他们的革命情操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